

人·物·春·秋

于北山先生的三重身份

■张同刚

近来,我整理以前的笔记,致力于淮阴师范学院校园文化的研究。睹物思人,脑海中不时浮现出于北山先生那勤勉机敏的风范、慈祥可亲的面容和清澈如水的声音。遂捡拾记忆,补写回忆文章,以寄托缅怀和自励之情思。于北山(1917年—1987年)原名于治来,字孝纯,河北霸县人。他有三重身份:年谱专家、教育专家、文史研究专家。

撰写年谱功夫深

于北山真是了不起,34岁即着手撰写《陆游年谱》一书。1961年,他44岁时,该书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,1985年又出过增订版。他撰写的《范成大年谱》初版于1987年。2006年9月,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《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》,其中《陆游年谱》《范成大年谱》均为重版,只有《杨万里年谱》是首次问世。

2007年1月23日,是于北山辞世20周年忌日,淮阴师范学院召开于北山“三谱”合璧推出座谈会,我作为校报编辑有幸参加了座谈会,记录了当时的盛况。

于北山之子——于蘊生将于老的治学经历、逸闻趣事娓娓道来:“撰写《杨万里年谱》时,家父在中学任教,课务繁忙,白天无暇写作。每到夜深人静之时,一桌一灯,一纸一笔,他便于古典文学之沃野之上聚精会神地耕耘。周末、寒暑假,家父要么与国学大师汪辟疆、古代文学批评史大师罗根泽、词学泰斗唐圭璋一起搞学术沙龙,要么独自泡在图书馆里。《杨万里年谱》曾被家母丢弃在走廊上煤炉旁边的火具筐内,覆以破纸杂物,与竹头木屑为伍。1969年,它又因为举家搬迁来到苏北,伴随父母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。1978年,家父放弃回南京工作的机会,来到淮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。苏北地区文献资料匮乏,家父不得不时常寻机远赴数百里之外的南京查阅资料。为适应图书馆的作息时间,他中午经常就近在路边小摊上吃两个菜包子和一碗馄饨,下榻条件之简陋,绝非今日可想象。《杨万里年谱》原稿因搁置20年之久,字迹已有少许漫漶,故重新誊录一遍,内容也有大量增补。”



于北山先生讲课风采

词学大师唐圭璋说过一句话:“小地方同样能出大成果,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的于北山由于倦翼思奋、壮心不已、勤奋耕耘,被推选为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。”

《陆游年谱》超越前人而后来居上,《杨万里年谱》《范成大年谱》是填补空白的创新之作。目前,“三谱”成了宋代文学研究者案头的必备书籍。

教书育人贡献大

我第一次见到于北山先生,是在1983年9月。他当时已经66岁,身材肥硕、精神健旺、声如洪钟。我当时18岁,是中文系的一名新生。他结合多年书法实践经验,教我们如何写好字。他说:“学字者,先学三年楷书,后学行草。做任何事都要像学书法一样,先从正楷练起,首先要打好基础。”

我的同班同学、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正伟,在于北山逝世20周年时发来电子邮件表达了对恩师的怀念:“于先生是我的老师。在我上大学时,他是最风趣的老师,也是学生最喜欢的先生。”

40多年前,于北山在淮阴师范专科学校文科楼二楼大教室开设宋代文学课的情

景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上课前,他总会根据课程要求认真备课,讲起课来十分细心。他讲解陆游临终前写下的那首千古绝唱——《示儿》时,不仅点出了诗人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,还揭示了爱国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道理。不仅如此,他还向学生提问:“后来,陆游的子孙有没有把‘王师北定’的好消息告诉他呢?”由此,他又讲解了宋末元初爱国诗人林景熙的《书陆放翁诗卷后》一诗。他用诗中“来孙却见九州同,家祭如何告乃翁”的诗句,揭示了南宋遗民的爱国情怀。他说,陆游的子孙确实看到了“九州同”,但那是元朝统治下的“九州同”,不是陆游期待的“九州同”,所以到了家祭之日,子孙不知如何向他禀告。于先生的教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当时,淮阴师范专科学校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,于北山却带了不少研究生。1983年,应南京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邀请,他为两校17名研究生讲授了为期4周的课程“中国官制史”。

1985年12月,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钱宁、张爱东,持其导师朱靖华教授的信函,前来跟随于北山学习。后

来,钱宁的著作《秦相李斯》和《圣人》为中国历史小说写作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张爱东成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化学院教授。

1986年6月,于北山受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、吴新雷委托,审阅中文系研究生程章灿的硕士论文《刘克庄年谱》,并提出“应予通过”的评审建议。

文史研究成果多

史料考订、年谱编撰诚然是于北山的强项,但其文学本体研究也多有斩获。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许芳红说:“于北山的研究解决了南宋文学史上很多重要问题,尤其在南宋著名文学家艺术成就判断、南宋文学史发展源流演变方面,他的贡献不容小觑。”

在《论“永嘉四灵”——〈南宋文学论稿〉部分》一文中,于北山认为,从宋元到现代,对“永嘉四灵”的评价总体来说毁多誉少,甚至有毁无誉,一概斥之为“破碎尖酸”“寒蝉哀鸟”,好像中国文学史上不该有他们的地位。这是很不公允的。他认为,“永嘉四灵”的诗歌“不用典故,不要花招,不设埋伏,不炫奇逞博,不夸多斗靡……流丽清新,自有独到之处”。

于北山当年还潜心研究职官,拟着手编写《职官史》和《职官大词典》,无奈天不假年,这两部著作最终没有完成。关于这两本书的书名,根据于北山逝世后周本淳、章明寿两位教授写的回忆文章,用的是《职官史》和《职官大词典》之名。

1994年,在于北山逝世7年后,其遗作《八千卷楼钞本〈诚斋全集〉中“跋语九则”笺》在文学理论刊物《文学遗产》上发表。作者在文末对到北京图书馆核对《诚斋集》的阎华同志谨致谢忱,体现了老前辈学人的严谨学风。

1988年,于北山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《杨万里诗文选注》。1996年,该书又由台湾建宏出版社再版,并收录于“中国古典文学选读”丛书中。

我时常在想,如果于北山先生能够把《职官史》和《职官大词典》写完,甚至写完《南宋文学论稿》,那该有多好!

考·证·链·接

王道生写《施耐庵墓志》的由来

■徐怀庚

正在修缮中的施耐庵罗贯中著书处的“耐庵书屋”院墙外,有一处王道生住过的旧屋。王道生何许人也?“耐庵书屋”墙外为何有他的旧屋?这要从王道生写的《施耐庵墓志》中的“先生家淮安,与余墙一间,惜余生太晚,未亲教益,每引为恨事”这句话说起。从此段话来看,王道生不仅是淮安人,而且其居所与施耐庵生前居住的院落(现在的淮安大香渠巷6号施宅)仅一墙之隔,两人是邻居。

那么“惜余生太晚”又没有得到施耐庵“亲教益”的王道生,是如何写出《施耐庵墓志》呢?这又得从王道生在福建建阳巧遇施耐庵的门生、《三国演义》作者罗贯中说起。

王道生在《施耐庵墓志》中说:“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,同寓逆旅。”从中可知,罗贯中和王道生是在福建相遇的。两人为何会在福建相遇呢?《施耐庵传》《罗贯中传》中也有相关叙述。施耐庵在明洪武三年(1370年)农历三月初二病故前夕,特地嘱托罗贯中找刻印店将他写了40多年的《水浒传》刻印出来。施耐庵病故后,罗贯中旋即离开淮安,到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成都等地寻找刻印店刻书。可店主们读了书中的内

容,竟然都不敢承接。后来,罗贯中听闻福建建阳自唐宋以来便是刻书重地,书坊林立,且当地雕版印刷水平远高于其他地方,便带着老师的《水浒传》书稿和自己写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书稿前往福建建阳。福建建阳多家刻书店的店主看了书稿后,都觉得写得很精彩,艺术性也高,可没有一家敢承接。

相传,罗贯中因两本书始终刻印不成,便来到路边一家小饭店内,一边喝酒一边叹息。邻桌一位道士见他不住叹息,便上前询问缘由。罗贯中将十多年来为刻书四处奔走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道士。道士从罗贯中的话语中听到了淮安、王肇庆等地名、人名后,激动地拉着罗贯中的手说:“我是淮安人王道生,做典当生意的王肇庆是我亲叔。我因幼年患病,许愿进入我们家西边的太清观修行,这些年来云游各地为重修太清观化缘,已有十多年没有回淮安了。你我今有缘在此巧遇,实属缘分。”罗贯中听说这位道士是淮安人,又是与他们师徒交情深厚的王典当的亲侄,觉得非常高兴。交谈中,罗贯中不仅讲述了师傅施耐庵的身世,还讲述了他们创作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情况,两人一直

聊到小店打烊。

王道生邀请罗贯中一起投宿在一座城隍庙道观内。王道生告诉罗贯中,此处的道长德高望重,与地方官员关系密切,又因观中经常刻印经书而熟识当地刻书界人士,或许可以请道长帮忙联系刻书。不过,因朝规森严,两书还是没有刻成。

道长阅读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后,爱不释手,组织庙中道士数十人誊抄了两书。此间,王道生便陪着罗贯中在建阳一带游山玩水。

正是罗贯中在闽巧遇王道生,多年以后,才有了王道生写的《施耐庵墓志》。王道生在《施耐庵墓志》中写道:“去岁,其后人述元先生,移柩南去,与余流连四日。问其家世,讳不肯道;问其志,又唏嘘叹惋;问其祖,与罗贯中所述略同。”这段话中的内容,在《施耐庵传》书中得到了印证,书中写道:“到明永乐十九年(1421年),施耐庵的长孙施文昱(述元),在王肇庆孙子王寿轩的帮助下,把施耐庵的墓迁到白驹场西落湖,并请淮安人王道生写墓志铭。”也就是说,王道生在福建结识罗贯中后,并没有写《施耐庵墓志》,而是在施耐庵去世50多年后、施耐庵的孙子去迁坟时,才写了《施耐

庵墓志》。

王道生在《施耐庵墓志》中写道:“公讳子安,字耐庵,元末赐进士出身。官钱塘二载,以不合当道权贵,弃官归里,闭门著书。死之年七十有五,而余尚垂髫。先生之著作,有《江湖豪客传》(即《水浒传》)。每成一编,必与门人校对。”这段文字,对于我们了解施耐庵、罗贯中的生平及研究《水浒传》,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

综合《施耐庵传》《罗贯中传》《淮安文学史》等书的内容,我们可知,在罗贯中去世150多年后,其后裔再次带着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书稿到福建建阳,在当地为官的兴化人宗臣(施耐庵生前在兴化城住过,相传还修缮过兴化城墙,口碑很好,后裔有人一直居住在兴化)的帮助下,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才在福建建阳经过雕版印刷问世。

据《施耐庵研究(续编)》载,王道生写的《施耐庵墓志》最早发表在1928年11月8日出版的上海《新闻报》副刊的《施耐庵世籍考》(作者胡瑞亭)一文中。文中还提到,王道生写的《施耐庵墓志》原在白驹施氏族谱中,同时公布的史料中还有一篇《耐庵小史》,作者袁吉人也是淮安人。